

经济学家的傲慢与无知

■ 宋小川 乔瑞庆

“只要教会鹦鹉讲供给和需求,鹦鹉也会变成经济学家”。这句嘲讽经济学家的名言至今没有让一些经济学家们警醒。

经济学家的傲慢与无知

一些经济学家自负地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社会的所有真理,而没有解释不了现象,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家却连自己学科领域的经济问题都束手无策。不是有这个嘲笑经济学家的段子吗?有人问上帝,为什么创造经济学家。上帝回答,因为有经济学家作对比,天气预报便显得准确多了。

真实情况也是如此。美国那么多经济学家,运用各种数学模型煞有其事地研究经济问题,可是次贷危机的发生,没能避免。如果无法避免问题出现,可以及时处理问题,也是好的。而更让人感到好笑的是,面对次贷危机,经济学家只会兴奋地激扬文字,却完全没有阻止危机进一步深化。

当然,必须承认,有一批谦逊的经济学家,在踏踏实实地研究问题,为人类处理经济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向或者增加了可供选择的解决问题的工具。不过,每天自以为是地胡说八道的经济学家也多得。而这些人多是对“自由主义”顶礼膜拜的经济学家。我们姑且称之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吧。这些经济学家有几个常用词语:自私、私有制、供给、需求、价格、平衡。他们用这几句话,形成了一个解释现象或者解决问题的模式:在私有制下,自私的个体追逐个人利益,不断制造供给和需求,通过价格调整,供给和需求会自行平衡,自私的个体各得其所,天下太平。再复杂的现象,在这些傲慢的经济学家眼里,都可以用这个模式进行经济学解释。可谓之“万能模式”。最近某经济学家的“合妻老妾说”就是“万能模式”的典型应用。

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有人预测到2020年大约出现3000万光棍。这个预测准确与否暂且不论,仅仅就某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办法,就让人知道“无知者无畏”是个什么概念。这位经济学家认为,“3000万光棍”不是问题,几个男人合妻老婆可以解决这个上涨。其逻辑如下:男多女少,女性的价格高,收入不高,支不起的男性,可以通过合妻老妾,解决夫妻生活问题,如果允许一妻多夫,光棍不是问题。用固定模式翻译一下:不存在价格管制(允许一妻多夫),女性价格上涨(女性变少),男性可以共同出钱购买(合妻老婆),男女性供需平衡(光棍问题解决)。

这明显是个混账逻辑。将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的概念穿凿附会地和性别失衡这个社会问题扯在一起,完全是自娱自乐,误导民众,哗众取宠。

其一,从该经济学家的分析对象看,他分析的是供需问题,而非家庭婚姻问题。他通过偷换概念,把性代替婚姻,论证自己的观点。性是生物学问题,而婚姻是社会学问题。婚姻包含了性,但性无法代替婚姻。婚姻需要性,更需要情感,还含有文化因子。该经济学家认为性可以代替婚姻,就犯了常识性错误。此外,用价格问题分析性的供需也是严重错误的。由于社会文化的原因,在很多地方,把性作为商品交换在道德上是不被认同的。如果非要用价

格分析性的供需问题,那无异于用油去灭火。

其二,价格无法反映情感,而婚姻的情感因素恰是最重要因素。用价格去度量情感就像用斤两度量天平一样荒唐。几个男人合妻一个男人,女人的情感天平肯定会倾向于某一个。情感的不平衡因而产生,这反过来影响婚姻稳定性。通俗地说,男人间的争风吃醋,会让婚姻破产。该经济学家用“那些偏远的穷地方,就有兄弟几个合妻一个老婆的,而且他们还过得其乐融融”证明其分析的合理性。这很荒唐。贫困地区不是他一个人去过,别人也去过,但是观察“兄弟共妻一妻,而且其乐融融”的有多少呢?不知道他观察的是哪个地方?此外,他还说“听说过几个女孩子养一个男朋友的吗?那几个男人养一个女人不可能吗?”这个更是强词夺理,荒谬至极。首先,他仅仅是听说,没有真正见到。其次,所谓的“养”也不是“结婚”。最后,他只是猜想几个男人养一个女人可以。把道听途说、概念偷换和猜想,用在论证上,是否太过滑稽。也许这个世界上某个地方曾经或许现在也有兄弟共妻一妻的现象。但我想这种现象的出现一定不是因为贫穷,而基于风俗和传统。即使是富裕的家庭,为了防止兄弟分家造成财产分散或流失,也可能出现兄弟共妻一妻的现象。但是这和共妻一妻和几个男人共妻一妻,毕竟不是一个概念。几个男人未必是兄弟。除非极端特殊的情况,否则,几个男人因为贫穷而共妻一妻的现象不可能存在。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因为这违反人性。这种现象仅仅存在于该经济学家的善于臆想的大脑中。

其三,“合妻老妾”无法解决光棍问题。所谓“光棍”不仅仅是单身概念,而且是个情感概念。光棍需要性,更渴求爱情。确切地说,男性的爱情解决了,光棍问题就解决了。而爱情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合妻老婆”也许解决男性性问题但无法解决光棍的爱情问题,所以光棍依然存在。如果仅仅从性上看待光棍,很显然,该经济学家把问题简单化了。他如此简单的处理问题,只是因为用价格分析性,比用价格分析情感简单。而事实,价格既不能分析前者,也无法分析后者。生拉硬扯只能徒增笑柄。

一个人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无知当成无所不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有具体的分析对象的,经济学的运行规律也有其适用领域的。脱离具体的分析对象,离开具体的适用领域,工具无效,规律也不会出现。

诚然,很多社会现象的出现都可以寻找到经济方面的因素。但是经济因素仅仅代表社会现象出现的物质基础,而不能代表社会现象能用经济学分析工具解释的。把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万能化,不是对经济学的尊重而是亵渎。“合妻老婆”仅仅是这种亵渎的一例。如果有兴趣,这样的让人啼笑皆非的主意还可以找出很多。人们喜欢滑稽小丑给生活增加乐趣,但绝不喜欢一些人的“惊人言论”污染耳朵,混淆视听,误导公众。所以,喜欢秀自己经济学分析能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是谦虚一点,多读点书,说话前,多动动脑子。

布,与其他社会科学显著不同。美国经济学会的组织结构极为简单,但学会的组织程序和决策方式高度集中,与根植于美国政治学会分散式决策的草根性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 经济学家的人生

西方经济学家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见解、信念和品位。他们更率直地追逐利己主义,又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气质或专业训练使他们更为自私。西方经济学家之间的观点越一致,离普通民众的观念就越远。经济学家们时常向政府提供建议,却无法使民众信服。

与普通大众对政府的抗拒心理相比,经济学家也像其他学科的大学教授那样,更相信政府一些,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政治观点与其他社会科学和商学院的教授之间还是有差距。

过去20年里,经济学家的收入增长很快,特别是那些明星经济学家的收入已经超过了顶级工程师的收入,而其他领域的学者,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中位数收入几乎没有增加。经济学家总是与私人企业和国际组织勾连在一起,这些机构不仅为经济学家提供资源及资料,还培养了经济学家干预世界的“习惯”或气质。经济学家对其理论的自信和经济学的社会地位,促使他们总是要跃跃欲试地解决问题。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更喜欢被“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社会学家则更喜欢被称为“社会批评家”或“科学家”。而政治学家大都把自己看作“知识分子”,但似乎不太愿意被贴上“科学家”的标签。

西方经济学家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不仅描述现实,还致力于“履行”或变革现实,经济学家干预世界的能力成为现实。西方现代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的能力可以在政府和其他机构得到运用和展示。不幸的是,社会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霸道持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在各种力量盘根错节、险象丛生下提供专家式的决策,所需的勇气和自信或许是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最大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它的致命弱点。

4. 经济学被高估了吗?

尽管经济分析和预测对政策决策及其争论至关重要,但是经济学家的计划和预测记录却令人失望。2015年2月9日,《纽约时报》以《经济学家被高估了吗?》为题,邀请六位从事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研究的学者,对经济学家的地位和作用展开分析、批判或辩护。这对于我们比较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优劣,防止经济学研究误入歧途,促进经济学和跨学科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 Diane Coyle 首先为经济学辩护。她认为,政府决策要平衡成本和收益,需要经济学家清晰地评估得失,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因而经济学家对政府来说,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有用。尽管有些决策不完善、不受欢迎,但这样做是经济学家的职责。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 Orlando Patterson 和他的研究生 Ethan Fosse,对经济学家的批判措辞激烈。他们认为,经济学家与普通大众

的观点差距往往大得离谱。经济学家每年在给自己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学术气十足的授奖仪式,掩盖不了他们的理论和政策在实践中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纽约大学商学院院长 Peter Blair Henry 认为,经济学家未能预测金融危机,恰恰说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经济学。经济学的成功在于运用历史和资料作为争论的工具,而不是做不切实际的预期。

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 Philip N. Cohen 指出,现实社会中,人们的信息是不完善、不准确的,并不能那么理性地简单使经济利益最大化。意识形态偏见和各种利益冲突,使得现实中的“例外”淹没了经济学家炮制的规则,从而使人们对经济学模型是否有用产生怀疑。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 Fourcade 指出,经济学知识与现实世界实际上是有含糊不清的。许多经济学研究深奥晦涩,充满内在的矛盾。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家更多关注的是其模型的精确性,而不是这些模型准确捕捉现实世界的能力。这一学术领域被少数精英控制,与其他社会科学隔离,容纳不下多元的观点和批判。经济学家还与政治游戏维持着复杂的批,使他们易于被不同党派、利益集团的分歧。也使他们的观点难以得到清晰的表述,更难以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 Charles R. Plott 认为,虽然经济模型遭遇了许多失败,但其普遍的成功就说明了,它在基本科学方面是健康的。Plott 还列举了它在环境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宏观货币政策领域的贡献和应用,认为没有任何其他学科在这些领域作出过如此重大的贡献。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力图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区分开。在日益流行的实验研究方法支持下,经济学正在运用各种复杂的技术检验和发展理论,力图解开许多异常复杂的经济现象之谜。经济学的应用及其结果,涉及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的确与众不同。但 Patterson 和 Fosse 指出,美国公众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远低于医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甚至低于社会学。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学使用统计模型,而在于他们对定性方法以及其他领域和观点的排斥。

关于“经济学家的傲慢与偏狭”是真或假命题的争论还将在西方继续,要等到西方社会经济真正爬出长期停滞的泥潭,人们才可能依据它如何使经济恢复做出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

马克思与数学

■ 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

撰写的最后一稿中删掉出去(第二稿,参见 MEGA2)。在出版第一卷第二版之际,马克思又对一些“数学”段落进行了修订。首先,他在解释为什么在讲剩余价值率时将不变资本设为零并运用一条“数学上的定律”时,删掉了对微分和英国数学家亨德的援引。他不再认可以前那种在我看来也是相当令人惊讶的)评注:在殖民地区,劳动需求与供应规律失效“就像泰勒的公式在微分计算中的一种情况”。如果不了解英国数学家泰勒(1685—1731年)在数学史上的地位,就看不懂这个比喻。马克思把它删掉了。由此他也就在《资本论》中删掉了唯一能够证明他在1878年以前很早就研究了泰勒的级数的线索。马克思在第二版中还删掉了一处与经济学和数学中虚拟的量相关的同逻辑学的“无限判断”进行的类比。此外,他还把“偏离或数学上所谓的‘误差’”改写为“数学上叫做‘误差’的‘偏差’”。这里说是近似值与精确值之间的关系。很可能马克思在出版第二版时也曾考虑,上面提到过的关于剩余价值率公式的重复原样。他最后维持了原样。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出版之前发生了什么?是有人鼓励马克思进行这种显然是系统的修改和删除呢,比如可能是他那位精通数学的朋友赛米尔·穆尔,也可能是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穆勒,马克思有朗格的著作《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以及社会科学经由凯里实现的所谓变革》杜伊斯堡1865年版,并在1868年读过这部书。在这部书中,朗格对凯里提出了合理的批评:认为“一切科学是统一的”的观点导致这位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经常滥用毫无意义的类比”(第162页)。马克思很可能认为,这一批评也是针对他自己的。或者马克思不是自己在这期间发现他以前尝试用而且喜欢用的那些高等数学的比喻很难理解,只具有“借来的说服力”呢?恩格斯在《反杜林

论》中对这类比喻做了恰当的质疑——尽管这并不是针对马克思和他本人的:“仅仅知道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的否定,既不能把大麦种好,也不能进行微分和积分”。

为了解释马克思出版第一卷第二版时的这些做法,2014年,我在阿姆斯特丹的马克思恩格斯档案馆中研究了这些数学遗稿。可以说,我为澄清这个谜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事实是,马克思早在1870到1871年间,也就是在他1870年年中中断了第二册第II篇的写作之后,就启用了4册代数学的研究笔记,而人们此前认为,这些笔记本写于1878年以及更晚的时期。一方面,他显然并且正确地,对《资本论》手稿中众多的数学表述感到不满意,例如,对剩余价值的推导。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总是希望,这一阐述在数学上要比利嘉图完成得更好。马克思不会对第II篇中对再生产图示的晦涩的文字表述感到满意。另一方面,杜能 and 拉德纳——后者是一位爱尔兰的博学学者,在第二册第II篇论述固定资本折旧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在将数学应用于经济之,《资本论》更大的成功,激励了马克思。总之,《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这些删改,很有可能是马克思这一系列数学研究产生的重要而合理的结果。

关于马克思的代数学笔记本本身,我在这里只想做出如下内容说明:这些手稿涉及的主要是一位经济学家,当他打算说明经济数值的极限、最大价值和最小值时,变化和组合时,他所需要的数学知识。我想再次强调这些笔记本中关于函数和导函数的概念的大量阐述。除了马克思力求从数学上证明他的论述确实是严谨的之外,他那个时代的数学家也在探究数学的科学“严谨性”,而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的著名社会学家则要求证明数学的“严谨性”,这一事实或许也起到了某种作用。马克思在1870—1871年间,并不是浅尝辄止地涉猎代数学的领域。马克思早期对数学的自负(例

如,在1858年他说:“代数迅速地温习一遍”)最终化为了谦虚。至于说马克思将数学研究作为消遣(拉法格的这一说法今天还广为流传),则是无稽之谈。

由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中删去了一些重要的段落,或者说,在1868至1870年间没有将以前文稿中那些“数学”段落吸收进第二册第II篇中,所以他就抹去了他在19世纪60年代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数学问题的重要痕迹。当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再版《资本论》第一卷、编辑第二册和第三册时,他就已经无法看到和利用这类痕迹。而恩格斯再版和编辑的《资本论》一、二、三卷又是俄文版和德文版全集第23至25卷的基础,而这也构成了读者理解接受的文本基础。从MEGA于1983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之后,英国数学家泰勒的名字才在1867年的120年后,再度和《资本论》一同被提起。

马克思为完成《资本论》第二册的最终稿本而努力的同时,从1878年起,开始比以前更加深入地研究数学。之前,马克思阐述了几何级的经济学的比例关系,经常用算术和几何级数来比喻相互依存的社会经济价值的不同发展,并且完成了对超额利润和平均利润的论述,现在他关心的是这些关系的数学基础。俄国科学家柯瓦列夫斯基在1876—1878年间几乎每周都拜访马克思,到莫斯科工作后仍在暑期定期拜访,他在1909年回忆说,马克思在“研究数学、微分和积分,以便自觉地对付当时政治经济学中刚出现的数学派。这个学派的领袖……在马克思的时代是杰文斯。”

以前,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柯瓦列夫斯基对资产阶级新古典主义者和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的提法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人们认为,这两种科学流派是完全针锋相对的。而现在,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将这位俄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看作一位可以严肃采

信的证人了。不仅越来越多的关于马克思研究杰文斯的事实材料浮出水面;这是必然的,因为杰文斯视价值为无用物毕竟针对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要害。对杜能的持续研究也可能促使马克思丰富其数学基本知识,尤其是微分学方面的知识。他在19世纪70年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入地研究分析了若干生产部门的农业的产量潜力,从而研究了级数地租的各种可能性,这一点我已经在关于新陈代谢的讲座中作了证明。

马克思在以前的阐述上添加新的阐述,在他之前的19世纪60年代的摘录上又新增加了比如萨奥利的摘录。除了大量的笔记本之外,他还“865页写满小的大分之一大张稿纸”。1881年,他将誊写工整的两篇文章寄给恩格斯评估;其中一篇涉及导函数的概念。他知道,恩格斯在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也研究了诸如微分学的历史地位此类的数学问题。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阐述大加赞许,马克思非常高兴(插入一句评论:恩格斯还能有什么别的创作么?比如,他更愿意看到《资本论》的副作有决定性的进展?),马克思却粗暴地回应了穆尔对他数学研究的用处的疑问:关于应用他还只字未曾提到。马克思的这个回答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接下来的编辑工作中,我会努力寻找答案。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向他展示的数学文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甚至在数学领域,“精通代数”的马克思也有独到的发现。1885年,在《反杜林论》第二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曾提到要发表这些“极其重要的”论述。在此之前,1884年,拉法格就在《经济学家杂志》上与保尔·勒鲁瓦-博利厄就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争论时,就曾宣布马克思关于微积分的著作将在一部马克思全集上发表。这一消息显然来自恩格斯,他在争论中支持拉法格。

(下转 04 版)

▶▶▶ [上接 02 版]

1868年1月初,马克思向恩格斯饶有兴趣地谈起《资本论》第一卷的“崭新的因素”,他提到,在将工资描述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时,“在高等数学中常常可以找到合理的公式”。马克思再次寻求与数学的类比。数周后,他反驳了恩格斯对循环公式 W-G-W' 的质疑:“人们要求新东西——形式和内容都新。”而资产阶级竞争者的类似的努力却受到马克思的贬低:1868年3月6日,他骂苏格兰经济学家亨利·邓宁·麦克劳德是“一个目中无人的蠢驴,他把每一个陈腐的同义反复一是套上代数,二是用到几何图形画上去。”

对于上面提到的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马克思的态度则要谨慎和感兴趣得多。马克思认为,他借助于微分学、会计学和实验观察来找出他的封闭的城市—农村模型的最优化利润的做法是“可敬的,同时也是可笑的”。他知道,他们两人存在关键的分歧,杜能支持社会公平,但是与社会正义保持距离。在读了《凯立国》之后,马克思也了解到,他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又是一致的,尤其是为找出在经济比例、收益和分配方面普遍有效的规律而采用的孤立抽象的科学方法。杜能“自己就明确地拿这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的部分分析法与(部分)微分的数学方法——他也经常使用这种方法——相类似”。

这种做法给马克思留下的印象,是否比他自己承认的还要深刻许多?几年后,杜能的遗著管理者海曼·舒马赫在给马克思寄了《孤立国》第三版之后又给他寄了自己的书《约翰·亨利希·冯·杜能. 研究者的一生》,对此马克思回信表示感谢。但是,在1872年《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时出版时,似乎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早在1868年到1870年间,马克思就把早期手稿中的一些“数学”段落,从第二册